

辽宁大学智库 简报

2024年 第4期

(总第33期)

辽宁大学中国开放经济研究院

2024年1月22日

2024年中国经济怎么看？怎么办？

余淼杰

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1月17日公布的2023年中国经济运行数据,经初步核算,全年国内生产总值(GDP)126.06万亿元,按不变价格计算,比上年增长5.2%。外贸总额41.76万亿,外贸顺差6万亿,外贸总量居全球第一位,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稳固。关于2024年中国经济将会如何运行,有两个基本判断:一是,具有5.3%至5.4%的增速潜力。能否实现取决于经济政策的落实效果。二是,2024年会形成约6万亿人民币的外贸顺差。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,系统部署2024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,为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、提供了根本遵循。关于“2024年中国经济怎么看？怎么办”谈谈个人的理解,即要做好五个坚持。

第一个坚持:处理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关系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,我国面临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复的改革发展任务。要实现2024年中国经济5.3%至5.4%的同比增长,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至关重要。一般谈到安全,指的就是包括粮食安全、生态安全、能源安全、产业安全和国防安全在内的五大安全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,必须要实现“以进促稳”。即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,发展是安全的保证”。1997年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,聆听了学界泰斗、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老师的讲座。厉老师认为,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许多问题,要解决问题,唯有发展才是良方。经济降速会导致问题愈发层出不穷,只有高质量的发展才能实现高水平的安全。这就是今天所说的“以进促稳”。实现这一目标的答案,就是“先立后破”(请注意,是“先立后破”,而不是“先破后立”)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于“绿色”的篇章,这里面涉及两个不同的思路:一是“先破后立”;二是“先立后破”。在全面系统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,如果采用“先破后立”的做法,在新能源产业尚未立建立的情况下,就取缔传统能源产业,必会导致供给不足,出现拉闸限电等负面现象。因此,必须坚持“先立后破”的做法。具体来讲,“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”是新能源应用的一个重要观测指标。2019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应用占比为15%,其中水电占8%、核电占2.7%、可再生能源占4.3%,美国差不多是16%的水平。据初步核算,2023年末至2024年初,我国相关指标已提高到约17.5%的水平,预期目标到2030年提升到25%。这可以说是任重道远。

此外,“先立后破”不仅涉及新发展理念中的“绿色”理念,事实上也涉及另外四种理念:创新、协调、开放、共享。

“先立后破”如何在创新中体现? 要提高创新占GDP的比重,或研

发占GDP的比重,即增加研发强度。统计数据显示,2023年我国的研发强度约2.66%,OECD国家也基本上是同样的水平。研发包括研究和发展,我们要做的工作是提高基础研究占研发的比例,而不是应用研究占比。“十四五”期间的目标是将基础研究占研究的比重从目前约6.6%提高到7%。需要指出的是,在这方面OECD国家已达到了约15%的水平。“先立后破”在创新中的体现就是基础研究。这也是为什么从前提“产学研”,现在特别强调“产学研用”结合的原因。

“先立后破”如何在创新中体现?协调包括两方面:城镇化协调和工业化协调。二者应均衡发展,不可偏颇。南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2020年南非的城镇化率为67.4%,城市及大城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0%。城镇平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,但在乡镇地区、非正式定居点以及市中心地区,“贫困城市化”正在增加,影响了城市和国家的稳定发展。反之,如果工业化发展太快,而城镇化落后的话,就会造成某一地区劳动力供应不足,工资成本上升,企业利润相应下降,给企业经营带来困难,影响可持续发展。目前,总体来看,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较快,城镇化发展较慢。所以,“先立后破”在协调中的核心重点就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。

“先立后破”如何在共享中体现?一是,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,这需要靠政府减税降费来实现。二是,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,提高中等收入水平。一个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0万到50万之间,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中等收入家庭,需要扩大的也是这一层级群体的数量。

第二个坚持: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战略任务和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。高质量发展包括生产、流通、消费、分配四要素,其中的关

键是生产。我国要实现成为生产大国、生产强国、制造强国的目标,生产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。高质量发展在生产中的体现是多方面的提升,即产品附加值的提升、质量的提升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。我国目前的全要素生产率约是美国的60%,2001年,我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时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美国的30%,20余年间增长了一倍。应该看到,虽然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仅为美国的60%,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产品就没有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。鉴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相比美国较低,只相当于美国的20%左右,二者相抵,我国的产品还是具有比较优势的。在行业层面,要实现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。第一是巩固全产业链优势,即要培育好包括41个大类,207个中类,666个工业小类的工业体系。第二是产业集聚。我国许多工业城市的发展并非面面俱到,而是具有自身的产业名片。例如,深圳的电子、东莞的电子加机械、汕头的玩具、云浮的石头、廊坊的家具、邢台的羊绒产业的集群等。第三是三大产业须合理协调发展。目前,第一产业占比7.5%,第二产业占比为39%,第三产业占比为53%。其中,第二产业所占的39%非常重要。并不是说实体经济创造就业,因为第三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更多。之所以要强调实体经济,是因为实体经济制造业是创新的载体,而创新是新发展理念中的第一源动力。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才能更好地避免我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。

第三个坚持: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。当前全球经济都处于一个相对低位运行的状态,如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就显得尤为重要。事实上,我个人认为2024年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工具是较多的。我国的物价水平较低,这对于传统宏观政策的实施较为有利。2024年,我们需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发力解决问题。经济学理论显示,如果经济比较低迷,要拉动经济,积

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工具。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“积极”起来？这里可以列举几个数据。2024年，国家层面有多少钱可以列支？答案是30万亿。这30万亿中包括21万亿的财政收入以及财政赤字。如果3月份召开的两会上把财政赤字率定在3%，那GDP的126万亿乘以3%就是3.78万亿。根据以往的做法，中央通常会在年中发行1万亿的特别国债，3.78万亿加1万亿就是4.78万亿。而2023年发行的1万亿国债中有5,000亿还没有消化，加在一起就是5.28万亿的赤字。如果按2024年的5.3%至5.4%经济增长速度计算，2024年的经济总量可达132万亿。新财年预计赤字5.28万亿除以132万亿可得4%，即2024年的财政赤字率的保守估计量应为4%。21万亿的预算内收入，加上5.28万亿的赤字安排，再加上地方的专项债（通常是3.85万亿），就得出30万亿元的国家层面列支规模。

除了积极的财政政策，拉动2024年中国经济还要靠适当宽松而稳健的货币政策。为此，上半年应该采取“以进促稳”，下半年则应采取“稳中求进”的政策。“降息降准”是“以进促稳”的重要手段。2024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中期借贷利率应下降10%至20%，长期借贷利率则应进行非对称调整，一年期长期借贷利率下降20个基点，5年期长期借贷利率下降10个基点。此外，预计在第二季度还要降低存款准备金利率。下半年政策调整的步伐会相对较慢。

当然，除了以上短期的宏观政策安排外，保证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还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，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做好员工的在岗培训。

第四个坚持：必须处理好改革和开放的关系。如果说对内改革只做一件事情的话，那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内大市场，统一的对立面不

是指“计划”或者“市场”，而是“分割”。换言之，中国经济向好的理由并不在于中国的劳动成本较低，而在于中国能否拥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，为此必须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大市场。统一的国内大市场首先必须是统一的要素大市场，即资本、土地、劳力、能源、数据等可以在国内有序地自由流动。如果再进一步改革的话，就是要使用包括废除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工具，目标是实现商品和劳务的统一、内外贸商品的“三同”。大家可能有这样的感受，在美国买到的中国品牌的衣服，质量更好、价格更低。原因在于中国品牌在国外面临更激烈的竞争，而在国内面对的竞争环境相对较弱。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形成一个国内的统一大市场，同质、同线、同标、同等质量。为此，必须要降低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成本，真正地优化营商环境。各级地方政府及市场监督部门要发挥积极作用，把“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”真正落到实处。这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。

关于外贸，上文提到了外贸顺差的估计规模是6万亿，那么外贸的总量如何？这个并不好回答。基本判断是2024年出口价格会上升，但是出口数量大概率增速不快。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，我国商品出口到欧洲，必须在好旺角转港，这一定会影响商品的出口数量。也是因为如此，供给不足造成欧盟地区对中国产品的价格需求上升。中国商品出口的新增长点在哪里？在东南亚、美洲（包括美国）。外贸的“抢出口”策略和相对疲软的人民币汇率都有利于中国商品的出口。我们的目标是形成更大规模、更宽领域、更深层次的开放，具体做法包括六个方面：第一，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。不建议企业做深出口、仅瞄准欧美这些全球市场。虽然这些国家的市场已较为成熟，但受政治因素影响，波动也会较大。鉴于此，要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，如东南亚国

家的市场和俄罗斯的市场。第二,扩大进口。2018年至今,我国召开了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,其目的之一是进口更多的消费品,这有利于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。从企业的角度来讲,有更多的中间品出现,可以产生 $1+1>2$ 的首比特创造效应。第三,服务贸易。服务贸易的发展方向是“扩总量、调结构、树特色”。当前,我国的服贸总量依然较少,仅8,000亿美元,而美国已经达到了1.3万亿美元。通过调整结构,缩小逆差,特别是教育方面的逆差是提高服务贸易总量的重要抓手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服务教育中走在了全国前列。2022年8月,我到辽宁大学工作后,把北大学科建设中好的做法借鉴到辽大。关于树特色,韩国的医美做到了全球第一,我国是中医药强国,有充足的理由要把中医药和中医的服务贸易做好。第四,对外直接投资。中国企业要“走出去,走进去,走上去”。“走出去”我们已经做得很好,每年“走出去”的规模已达到1,350亿美元。“走进去”是指要加强在境外投资的正面宣传及影响,在民心相通方面需要进一步拓展。“走上去”是指赴境外投资不能仅看到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工成本相对较低,更重要的是要做到在商言商,在商业交往中保持公正、公平的态度,提倡正当竞争,反对欺诈和不诚实的行为。第五,对外开放。“一带一路”倡议要实现差异化和“两条腿走路”,陆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应该向东而不是向西。在俄乌冲突、巴以冲突的背景下,加强与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经贸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。海上丝绸之路需要向北发展,我们之前呼吁建立“中东—西亚—北非”自贸区,但当下战火又起,这一方向的经贸合作很难展开。可以考虑向北发力,继续推进中日韩经贸合作,推进中日双边贸易,加强中日韩经贸谈判,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向北的一个原因。正因为如此,辽宁省正在向国家积极呼吁将“东北海陆大通道”上升为国家

战略。

第五个坚持：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任务。中国式现代化博大精深，其中应特别加强精神文明建设。在物质文明方面，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。精神文明建设方面，高校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。高校作为育人的最重要载体，就是要做到格物致知，心诚意正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就像我们北大创业的这些老师、同学、师兄、师姐、师弟、师妹们一样，真正能把事情慢慢做起来。路虽远，行则将至；事虽难，做则必成！

注：本文根据2024年1月20日余淼杰在中国创业者峰会(北京)上的主题演讲整理。

作者简介:余森杰,1976年生,教授,博士生导师,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,现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、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、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、校长。国家级人才项目获得者、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、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、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、财政部“中美研究智库联盟”理事、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名誉教授、俄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国际顾问理事。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、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、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、辽宁省社科联副主席、黄廷芳/信和青年杰出学者、全球经管类前1%高引论文经济学者,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“英国皇家经济学奖”的华人学者。被联合国、亚洲发展银行、财政部、商务部、国务院参事室和多个地方政府聘为专家顾问,被专门邀请到联合国总部做中国经济发展报告。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

辽宁大学智库简报编委会

策划:潘一山	主编:余森杰				
编委:李淑云	史保东	霍春辉	姚树洁	王振宇	刘钧霆
李艳枝	白永生	张贺明	崔 铮		
编辑:尹如玉	校对:李楠楠	联系方式:024-62602446			

本刊声明:所刊文章属作者个人见解,不代表编辑部观点。

请把领导批示和转载情况反馈编辑部。